

讽寓阐释的异域回响 ——江户时代《古诗十九首》日本注本考论

卞东波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江户时代产生了四部《古诗十九首》的注本,其中两部是汉文注本,另两部则是假名注。本文对两部汉文注,即原公逸的《古诗十九首解》、石作贞的《古诗十九首掇解》的学术背景与阐释特色进行了考论,发现这两部注本皆注重对《十九首》进行“讽寓阐释”(allegoresis),多从君臣关系、君子—小人的角度来解诗。江户时代四部《古诗十九首》注本至少有三部与当时的折衷学派有关,折衷学派不满当时的“古文辞学派”,不喜流行一时的伪唐诗、明诗,揭露古朴的《古诗十九首》应是出于此目的。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日本注本;《古诗十九首解》;《古诗十九首掇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9)05-0044-10

Allegorical Expounding and Exotic Interpretation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With Japanese Annotations Edited in the Edo Age

BIAN Dongb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four versions of *Nineteen Ancient Poems* with Japanese annotations edited in the Edo Age. The annotations of two versions were written in Chinese, and the other two were in Katakana. The paper tries to explore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interpre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written in Chinese, namely, Hara Kyosai's *Gu Shi Shi Jiu Shou Jie* and Ishizukuri Kuseki's *Gu Shi Shi Jiu Shou Duo Jie*. It was found that these two versions focused on “allegories” of *Nineteen Ancient Poems*, 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arch – minister and gentleman – villain to interpret poems. Three annotations of them were related with the so – called “Eclectic School” in the Edo Age, who were discontented with “the School of Ancient Rhetoric” at that time, and dissatisfied with the prevailing fake Tang and Ming poetry, then turned to the simple and plain *Nineteen Ancient Poems*.

Key words: *Nineteen Ancient Poems*; Japanese annotation; *Gu Shi Shi Jiu Shou Jie*; *Gu Shi Shi Jiu Shou Duo Jie*

一、引言

以《古诗十九首》(下简称《十九首》)为代表的汉魏“古诗”在“世说新语时代”^①颇为流行,《世说》

① “世说新语时代”一词,出自宗白华《〈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见《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收稿日期:2019-07-10

基金项目:早稻田大学高等研究所访问学者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中国古代文集日本古写本整理与研究”(编号:2018VJX025)

作者简介:卞东波(1978-),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域外汉籍。

中多次可见当时名士称引“古诗”诗句者，如《世说·文学篇》载：“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暭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暭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此二句即见于《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十九首》乃一组流行汉魏之际的无名氏所作的诗歌，这组诗歌当然不止十九首，^①然以收入《文选》且定名为《十九首》的诗歌最为著名，钟嵘《诗品》列为上品，且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十九首》风格高古，几无用典，不过正如田晓菲教授指出的，这组诗歌“文字表面上直白透彻”，实则机关重重，有着很多“隐含的信息”，盖缘于其“自身的隐性诗学属性”。^[1]

中国历代也产生了不少《十九首》的注解和注本，如唐李善与五臣《文选·古诗十九首》注、元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明陆时雍《古诗十九首解析》、清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清张庚《古诗十九首解》、清姜任修《古诗十九首绎》、清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清张玉穀《古诗十九首赏析》、清方东树《论古诗十九首》、清饶学斌《古诗十九首详解》、清刘光蕡《古诗十九首注》等，基本见于今人隋树森所编的《古诗十九首集释》中，但很可惜隋先生《集释》没有收入日本的注本。

日本文人接触《十九首》主要是通过《文选》，《文选》很早就东传到日本，而且是平安时代贵族必读之书，《十九首》就收录在《文选》中，早已为日本人所阅读。另外一个渠道就是书法，文徵明书写的《十九首》行草真迹流传到日本，^②在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江户时代汉诗人本多忠统（1691—1757）《摹文衡山真迹跋》云：“文衡山《古诗十九首》行草书一卷，虽晚笔哉，遒丽风骨，殆苍然晋人之后，似者谁也。”^{[2] (P140)}明治时代书法家日下部鸣鹤（1838—1922）跋文徵明真迹云：“文衡山真迹《古诗十九首》，古健遒爽，神采飞动，清俊之气，奔行间。款曰年八十八，而通篇无一懈笔。”受此影响，日本书法家也专门手书过《十九首》，如江户时代书法家细井广泽（1658—1736）就书有《古诗十九首》。^③通过阅读与书法，《十九首》在日本汉诗界颇有影响。明治时代著名汉诗人森槐南（1862—1911）尝云：“《古诗十九首》直不野。”^{[3] (卷2, P25)}森氏又有诗云：“《古诗十九》婉多风，兴到新词愧未工。天籁休将人籁较，不妨好句偶然同。”^{[3] (卷20, P207)}森槐南用“直不野”“婉多风”来评论《十九首》，甚为精到。用“直”来评价《十九首》也呼应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十九首》“直而不野”之语。特别是“婉多风”道出了《十九首》诗意图含蓄委婉的特质，“风”即“讽”，即《十九首》有“言此意彼”的“讽寓”（allegory）性质，^④则颇符合日本江户时代《十九首》注本的阐释特色。日本近代汉学家川田瑞穗（1879—1951）有诗云：“苏、李唱酬皆五言，《古诗十九》是渊源。最欣无缝天衣似，长为后人开法门。”^{[4] (P22)}此诗则指出了《十九首》是汉魏五言古诗的渊源，而所谓苏武、李陵的唱和可能亦导源于《十九首》，而非汉初之作；《十九首》在艺术上似乎天衣无缝，为后世创作开启了法门。

除书法传播与诗歌评论之外，日本对《十九首》的接受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江户时代还产生了多部《十九首》的注本，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篇》第一辑收录四部《十九首》的日本注本，其中原公逸《古诗十九首解》、石作贞《古诗十九首掇解》为汉文注释，中西淡渊《文选古诗十九首国字解》、山景晋《古诗十九首国字解》为假名注本，下文对《古诗十九首解》《古诗十九首掇解》两部汉文注本略作考证。

二、原公逸《古诗十九首解》考论

《古诗十九首解》（下简称《十九首解》）不分卷一册，原公逸撰，江户藻雅堂舟木嘉助刊本。该书四

^① 关于汉魏之时流行的“古诗”及其形成，参见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② 真迹原是石桥犀水（1896—1993）的藏品，《书学》第24卷第12号特集：文徵明《古诗十九首卷》（日本书道教育学会，1973年12月）收录了此幅作品。参见石桥犀水《文徵明古诗十九首卷的传来》，载《书学》第24卷第12号。

^③ 见下中弥三郎发行《细井广泽古诗十九首》（《和汉名家习字本大成》第三十卷），东京：平凡社，1934年。关于对细川广手书《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参见平野和彦《细井广泽与其时代——文衡山影响日本近世书坛之一侧面》，载李郁周主编《尚古与尚态：元明书法研究论集》，台北：万卷楼，2013年。

^④ 关于“讽寓”及“讽寓解读”，参见苏源熙著、卞东波译《中国美学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周单边，白口，单鱼尾，版心刻“十九首解”，下记叶数，第二叶版心有“狂斋藏”三字，则此书可能是原公逸家刻本。该书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注文为双行夹注。书前有天明三年(1783)鸠陵盖延龄《古诗十九首解序》，以及原公逸本人之序。该书在关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宫城县图书馆小西文库皆有收藏。

原公逸(1735—1790)，字飞卿，号狂斋、修真道人，通称豹藏，淡路(兵库县淡路岛)人。狂斋家世仕于稻田氏，“性不好官，廿一岁托家事于三弟，辞禄漫游于浪华、京师，应接诸名流，五年于此。后到江户，入于井金峨之门，寓塾五年。”^{[5](卷十一,叶16a)}井金峨，即江户儒学家井上金峨(1732—1784)。井上金峨，名立元，字顺卿(纯卿)，通称文平，号金峨、考槃翁、柳塘闲人等。金峨乃江户儒学折衷派之代表，《先哲丛谈后编》载：

金峨之学不偏主一家，取舍训诂于汉唐之注疏，折衷群言，磅礴义理于宋明之诸家，撰择稳当，以阐发先圣之遗旨，匡前修之不逮焉。与近世经生胶滞文字，恣意悍言，求异先儒，联比众说，务事博杂，夸诬后学者不同日而语也。宝历以降，人知物赤城、太宰紫芝以韩商之学，误解六经，绕缠圣言之害者，其辨斥攻击，自金峨始焉。关东之学，为之一变。近世所谓折衷家者，若丰岛丰洲、古昔阳、山本北山、大田锦城等诸家，皆以经义著称，其实皆兴起于金峨之风焉云。^{[6](卷七,叶20a)}

当时江户思想界流行着朱子学、阳明学、反朱子学的古文辞学派，井上金峨能够“不偏主一家”“折衷群言”，诚有识见。上文中的“物赤城”即荻生徂徕，“太宰紫芝”即徂徕弟子太宰纯，皆为古文辞学派的代表人物。当时古文辞学派风行一时，影响甚巨，而井上金峨能在此风偃草靡之时，对古文辞学派“辨斥攻击”，显示其卓见和勇气，遂使“关东之学，为之一变”。

原公逸虽仅小井上金峨三岁，但能师事之，受其影响甚深，二人对当时最为流行的荻生徂徕的古文辞之说多所攻击，《先哲丛谈续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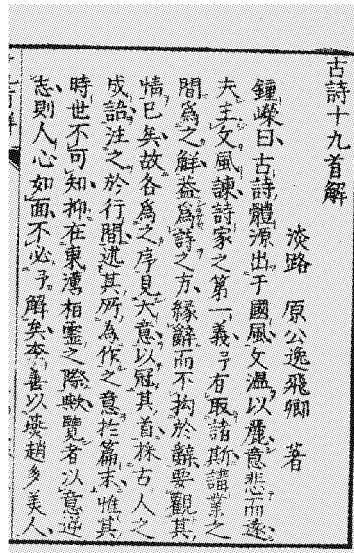
宝历初，井金峨专唱折衷经义于汉宋历代之众家之说，排击物徂来(徕)修古文辞始知古言之说，其业行于一时，狂斋奉崇其说，能赞成之，继而和者数家，薰园、赤羽之学为之寝衰。故坚守旧习者，视金峨、狂斋等，殆若仇雠而不能与之争，妒忌者甚多。^{[5](卷十一,叶16a-b)}

狂斋受到井上金峨极大的影响，而金峨亦非常喜欢狂斋，《先哲丛谈续编》称，“至其(狂斋)到东，入于金峨门，始识学之所向，而信服之。金峨爱之，逾他弟子”。^{[5](卷十一,叶17b)}以至于金峨去世之后，狂斋“郁悒不乐，自髡，号修真道人”。^{[5](卷十一,叶20a)}狂斋“自视缺然，绝意仕进，放浪艺苑，故其学术之醇，识见之粹，实非时流之所能企及也”。^{[5](卷十一,叶18a)}著有《周易启蒙图说》《周易汇攻续》《古诗十九首解》等。

《十九首解》前有盖延龄序云：

余读原子所著《古诗十九首解》，喟然叹曰：美哉！此君子之志也。盖自有《十九首》之传于世数百年，人玩其华、珍其词，则世有之，而独至于其发作者忠厚之志、微意所存者，则寥寥乎无所闻。则其传于世，亦犹不传也，不可惜哉！南海原子学识卓立介然，恒存古人之志，故其为古人之诗，所以取义逆志者，殊出人意表，乃所以有此解也。呜呼！《十九首》之传于世，数千年，而后乃今始有原子之解，而终不隐没作者之志者，岂可不谓奇遇哉？天明三年，岁在癸卯秋九月，鸠陵盖延龄识。

序称《十九首》一千多年来没有注解，当然是不正确的，作者这样说，无非是要强调“原子之解”的重要性。据序称，原狂斋解《十九首》的特色就在于能够以意逆志，“发作者忠厚之志、微意所存”，“不隐没作者之志”。序者反复强调“作者之志”或“微意”，也就是强调《十九首》并非像传统解读那样只是写游



予思妇之情。这种对“作者之志”的强调，在原狂斋之前的清人吴淇（1615—1675）《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以意逆志》已有类似的说法：“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7](P34)}可见，吴淇和原狂斋都相信，诗歌表面的“文”“辞”，与诗歌蕴含的“志”“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也就是说“文”“辞”并不等于“志”“意”，这就为阐释提供了空间。我们不能说，原狂斋是受到吴淇的影响，但这种在《十九首》阐释中注重以意逆志，强调解诗者的能动性两者惊人的相似。

原狂斋本人的序云：

钟嵘曰：“古诗体源出于《国风》，文温以丽，意悲而远。”夫主文风谏，诗家之第一义。予有取诸斯，讲业之间为之解。盖为诗之方，缘辞而不拘于辞，要观其情已矣，故各为之序，见大意以冠其首。采古人之成语注之于行间，述其所为作之意于篇末。惟其时世不可知，抑在东汉桓、灵之际欤？览者以意逆志，则人心如面，不必予解矣。李善以“燕赵多美人”别为一章，今从之，定为二十首，暂存其旧，曰《十九首解》。天明癸卯六月望，书于狂斋南窗下。

天明癸卯，即天明三年，可见《十九首解》当成书于该年。从狂斋之序看出，该书是在其授业之讲义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他认为，诗之“第一义”在于“主文风谏”，而非言志、缘情，也就是说，他更看重诗歌的社会或政治功用。本序也介绍了其解《十九首》的方法，首先是学习《诗小序》的方式，给《十九首》每首写了一篇小序，概括此诗之大意，如“行行重行行”一首，序云：“贤者放逐，不得立朝，苟全身远害而已。”“今日良宴会”一首是：“燕友伤时也。”“西北有高楼”一首则是：“刺听谗也。”这种解诗方式与《诗小序》如出一辙。

比较有特色的是其对诗句的解释，传统的注释注重训诂，解释词义，疏通诗意，而该书则是“采古人之成语注之于行间”，即对诗句的注释直接引用成语或古诗原句来解释其意，如注“行行重行行”一首如下：

行行重行行，日斯迈，月斯征。与君生别离。悲莫悲兮生别离。相去万里余，各在天一涯。山川悠远。道路阻天涯且长，万里余，会面何可知。如之何勿思？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狐死首丘。去日已远，不日不月，曷其有活。衣带日已缓。懵懵日瘁。浮云蔽白日，维曰干仕，孔棘且殆。游子不顾返。畏此罪罟。思君令人老，无背无侧，无陪无卿，维忧以老。岁月忽已晚。不我与。弃捐勿复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努力加餐饭。稼穡维宝，代食维好。

这种用古诗原句来注释诗歌的方式在东亚诗歌注释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而且据笔者观察，注中所引诗歌之成句大部来自《诗经》和《离骚》，如“日斯迈，月斯征”，见于《诗·小雅·小宛》（原句是“我日斯迈，而月斯征”）。“悲莫悲兮生别离”，见于《楚辞·九歌·少司命》。“无背无侧，无陪无卿”，见于《诗经·大雅·荡》（原句是“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见于《诗经·邶风·谷风》。全书对《十九首》的解释基本如此。这种“以诗注诗”的方式，虽以韵文为之，但亦能发诗歌之意。用如“悲莫悲兮生别离”解释“与君生离别”，确实道出了诗句后的“悲”字，而且“生离别”出典也确实出自《少司命》。用“狐死首丘”来解释“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亦比较恰当。

但是在“述其所为作之意于篇末”的部分，狂斋的解释又回归传统。日本古代注释中国文学的传统，基本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专注于对诗句文字、典故的训诂和解释，如廓门贯彻的《注石门文字禅》、拙庵元章等的《冠注祖英集》等；另一派则注重对诗歌背后微言大义的发挥和阐发，如室町时代的《中兴禅林风月集注》等。江户中期海门元旷所作的《禅月大师山居诗略注序》中曾云：“余所注者，只在质于事实耳，其如演义，余岂与也哉！余岂与也哉！”这里海门元旷将“事实”与“演义”分得很清楚，所谓“事实”就是语典、事典，而“演义”则是诗意的推衍、发挥。狂斋的《十九首解》属于“演义”一脉，其诗歌解释注重诗意的发挥，且看对“行行重行行”一诗的解释：

赋也。凡忠臣冀君从其谏，庸主忌臣不从其欲，是以其相违不啻胡越也。忠爱之情，不忘其始，憔悴枯槁，欲进尽忠，恐为谗佞所中，虽忧其无辅弼，亦未如之何。岁聿其逝，前路可知。

矣。自知有命苟安焉，是箕子所以为奴也。

用赋、比、兴来解释诗歌，是《诗小序》固有模式，《十九首解》又重拾此种阐释方式，其解“青青河畔草”为“兴而比也”，解“青青陵上柏”为“兴也”，不一而足。同时，从君臣关系角度解释《十九首》自唐人注《文选》时即已为之，如“行行重行行”一首，《文选》五臣之张铣注云：“此诗意为忠臣遭佞人谗谮见放逐也。”解诗中“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李善注云：“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反也。”五臣之刘良注云：“日喻君也，浮云谓谗佞之臣也。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可见，无论从被讥为“释事而忘意”的李善注，到五臣注都比较注意此诗背后的微言，盖“浮云”“白日”之类的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确实有隐喻之意，正如李善注引陆贾《新语》所云的：“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但将此诗解释为臣子对君主的“忠爱之情”则是狂斋的发挥。

原狂斋对《十九首》的阐释基本上都是从君臣大义的角度切入，虽然也可以从中国古典诗歌阐释传统中找到其渊源，但《十九首解》无疑将其发挥到极致，每一首都用这种方式解诗，再如解“西北有高楼”一诗云：

比也。乾位西北为君，宜体仁以临下，而小人蔽贤者之与居焉，故佞臣得志，姻亚焜耀于牕仕，班以成私家，不为社稷深思远虑，是以上下否塞，民人怨謗，谁莫亡国之哀乎。悲哀之情，不自胜也。盖事君致其身，安爱其劳，然君莫知之，微子去殷，岂其情乎？《北门》之叹，不唯《卫风》矣。

李善解释此诗为：“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人者稀也。”这种解释比较朴实，也可以理解此诗背后的隐含义，但没有将此诗发挥到“小人”“佞臣”，以及君臣关系的高度，《十九首解》的解释显然有过度阐释之虞。不过，不能将其简单视为牵强附会，而应从东亚诗歌解释史的脉络来观察。狂斋的解释基本与《文选》五臣注的理路颇为相近，如“西北有高楼”一首，李周翰注云：“此诗喻君暗而贤臣之言不用也。”而且将《十九首》中的物象与君臣关系、君子、忠臣、贤人、小人和佞人等进行比附也是五臣注的特色，^①再如“迢迢牵牛星”一诗，吕延济注云：“以夫喻君，妇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为谗邪所隔，亦如织女阻其欢情也。”“东城高且长”，张铣注云：“此诗刺小人在位，拥蔽君明，贤人不得进也。”狂斋的解释与五臣注如出一辙，不过五臣注比较简单，往往只有一两句话，而狂斋之注则将这种模式贯彻全书，而且较为系统化。

另外，用赋比兴定义诗意也见于元代刘履《选诗补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选诗补注》和《十九首解》两书的解释：

《十九首》篇名	《选诗补注》	《十九首解》
《行行重行行》	赋中有比也	赋也
《青青河畔草》	兴而比也	兴而比也
《青青陵上柏》	兴也	兴也
《今日良宴会》	赋也	赋也
《西北有高楼》	比也	比也
《涉江采芙蓉》	赋也	比也
《明月皎夜光》	赋而兴也	兴也
《冉冉孤生竹》	兴而比也	比也
《庭中有奇树》	赋也	比也
《迢迢牵牛星》	比也	比也
《回车驾言迈》	赋也	赋也
《东城高且长》	赋而比也	兴也

^① 关于这一点，李祥伟《走向经典之路：古诗十九首阐释史研究》第四章《经学的诗法——教化性比兴解读》（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有详细和非常好的论述，可以参见。

《十九首》篇名	《选诗补注》	《十九首解》
《燕赵多佳人》	赋也	比也
《驱车上东门》	赋也	赋也
《去者日以疏》	赋也	赋也
《生年不满百》	赋也	赋也
《凛凛岁云暮》	比也	兴而比也
《孟冬寒气至》	比也	兴也
《客从远方来》	赋也	比也
《明月何皎皎》	赋也	比也

《十九首解》用赋比兴的方式解释《十九首》一方面是受到《诗集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选诗补注》的直接影响。但我们从上表也可以看出,二书对《十九首》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如“涉江采芙蓉”一诗,《选诗补注》认为是“赋”,而《十九首解》则认为是“比”,就这首诗而言,可能《十九首解》更有说服力,《文选》五臣注早已指出了此诗用了“比”之法:“翰曰:此诗怀友之意也,芙蓉、芳草以为香美,比德君子也,故将为辞赠远之美意也。”这种对《十九首》的阐释方式,在后代并没有断绝,如宋代唯一一部《文选》注释书曾原一所著的《选诗演义》卷上在注《十九首》时亦用相似的方法,^①如解“青青陵上柏”:“是藏意于言外,意谓戚戚之甚迫也。纵情之过戚忧,随之,不迫者乃所以深迫。其感叹微讽之辞欤?此兴也、风也。”曾原一解“青青陵上柏”为“兴也”,与《选诗补注》《十九首解》相同。虽然《选诗演义》在中国本土失传,但在元代时其依然存世,并对《选诗补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 上文提到的清人吴淇,在《古诗十九首定论》认为,《十九首》“要皆臣不得于君,而托意于夫妇朋友,深合风人之旨”。^{[7](P76)} 清人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总说》中提出:“诗有性情,兴观群怨是也。诗有寄托,事父事君是也,诗有比兴,鸟兽草木是也。……叹《十九首》包涵万有,磕着即是。凡五伦道理,莫不毕备。”^{[8](P51)} 可见,从比兴寄托的角度解释《十九首》是东亚诗歌解释的长久传统和共通之处,那么将原狂斋《十九首解》放在这个脉络中加以观照的话,也就可以理解其阐释方式的渊源了。

另外,从日本的中国诗歌阐释史来看,《十九首解》这种解诗方式也是渊源有自。仅举一例,如南宋人所编的宋代诗僧文集《中兴禅林风月集》,有日本中世时期僧人之注(即《中兴禅林风月集注》),其解诗亦从君臣关系切入,以君子、小人作喻,如解卷上僧显万《乘槎图》“昆仑初不隔悬河,逆浪吹槎去若梭。莫信银湾清且浅,料知高处更风波”云:

昆仑山比朝廷大臣也。大臣如城郭藩篱也。悬河比朝廷,今君不明而朝廷暗昧,君臣矛盾,故大臣不在朝廷,邈居荒僻之地也。梭,比贤人进欲拔身也。银湾,高处,比朝廷。风波,比逆政险。言图面虽似浅,定知高处波浪恶也。君子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于不义之禄,故逃野急。^{[9](P397)}

我们可以看到,《中兴禅林风月集注》解诗方式就是认为诗中每个物象背后都有政治隐喻意,一首诗歌就像一篇政治寓言^③。《十九首解》虽然没有这么穿凿附会,也没有指出诗歌物象后的隐喻意,但我们可以看到其解诗方式其实是相同的^④。笔者曾将这种解诗方式称之为“讽寓阐释”(allegoresis)^⑤,所谓“讽寓”(allegory)指的是一种“言此意彼”的解释方式,诗歌的字面意与隐含意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就为诗学阐释提供了空间。“讽寓性解读”是日本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从《中兴禅林风月集

① 参见卞东波《曾原一〈选诗演义〉与宋代的“文选学”》,载《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② 参见芳村弘道撰、金程宇译《南宋选学书〈选诗演义〉考》,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③ 关于《中兴禅林风月集抄》解诗方式,参见卞东波《〈中兴禅林风月集〉考论》,载《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④ 日本关于黄庭坚诗歌《演雅》的阐释也用了相似的方式,参见卞东波《宋代文本的异域阐释——黄庭坚〈演雅〉的日本古注考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⑤ 参见卞东波《曾原一〈选诗演义〉与宋代的“文选学”》,载《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注》、《演雅》解释、《十九首解》一以贯之都用了这种方式。从这种角度来看,就能理解了《十九首解》在日本出现的背景了。

三、石作贞《古诗十九首掇解》考论

《古诗十九首掇解》(下简称《掇解》)不分卷一册,石作贞撰。该书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版心刻“古诗十九首”,下记叶数。该书每半叶六行,行十二字,注文为双行夹注。书前有石作贞之序,末有“翠山楼藏版”字样。该书在关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实践女子山岸文库、安昙野市丰科乡土博物馆藤森桂谷文库皆有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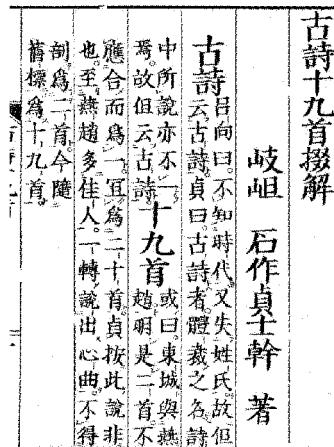
石作贞(1740—1796),字子幹,一作士幹,号驹石,通称贞一郎,信州(长野县及岐阜县之一部分)人。累世仕于信浓福岛之邑主山村氏,特别是得到山村氏家子山村良由(号苏门)的赏识。明和三年,往伊势桑名,从学于儒学家南宫大湫(1728—1778),“日夜诵习不怠,寝食共废,其学大进”。^{[6](卷八,叶22b)}学成后,归乡福岛,邑之子弟,皆从其学。有吏才,深受山村氏重用,为邑计吏,三年而后邑中为之不匮。后为室老,“治下举措决于其手”。^{[6](卷八,叶23b)}宽政八年卒。著有《论语口义》《翠山楼诗集》《莫逆集》《劝学言志编》《古诗十九首掇解》等。从上可见,石作贞并非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一个地方的儒士,长于吏事,雅爱汉学,多有著述。

值得注意的是,驹石的老师南宫大湫乃中西淡渊(1709—1752)弟子,而中西淡渊也著有《文选古诗十九首国字解》,那么石作驹石著《掇解》亦是承师门之习。上文考证原狂斋乃江户时代所谓折衷派之学者,而中西淡渊、南宫大湫亦被视为折衷派学者。中西淡渊,名维宁,字文邦,号淡渊,通称曾七郎,三河(爱知县)人。名古屋藩家老竹腰氏之家臣,宽延三年(1750)至江户,于芝三岛街开讲堂,号从桂社,“四方之士,向风辐辏”。^{[6](卷五,叶11a)}中西淡渊为学尚折衷,“其讲经不拘汉宋,而别新古,从人所求,或用汉唐传疏,或用宋明注解”。^{[6](卷五,叶11a)}石作驹石之师南宫大湫,名岳,字乔卿,号大湫,通称弥六,美浓(岐阜县)今尾人。本姓井上,后改姓南宫。大湫“蚤有神童之称”,^{[6](卷六,叶13a)}师事中西淡渊,其“学既渊茂,立志以笃实忠诚自勗,其教子弟也,抑浮华而先德行;自处也,履实理而无虚动。居趾进退好依礼义,不苟言笑”。^{[6](卷六,叶13a-b)}大湫先游于京都,后往伊势桑名,“侨居授徒,从游甚众,三都之士,莫不识名,声价著闻于一时”。^{[6](卷六,叶13a)}驹石正是在桑名师从大湫的,自后学问大进。可见,驹石的学术渊源亦是折衷派。

《掇解》前有驹石所作之序:

诗者,景情之二,而有六义焉。若夫三百篇,善美之至,毋论尔,次之《古诗十九首》辞情婉曲,实所宜师法者也。其在昭明之《选》中,不便诵读,余别为一册子,删六臣旧注以附之,而聊以愚管为增注,且概以大意,标各篇之首。盖窃拟卜氏《小序》云。呜呼!虽不免蛇足之讥,抑亦训蒙之一助而已。

该序透露了驹石本人所持的诗学观,他认为诗分为景和情(南宋周弼《三体诗法》称之为“实”和“虚”)两部分,同时又有赋、比、兴、风、雅、颂之“六义”。又认为,《诗经》是最高的美学规范,所谓“善美之至”。他用“辞情婉曲”来概括《十九首》,这也暗示了《十九首》诗意并非如其字面明白如话。明人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曾云:“《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10](P1178)}但此语明显低估了《十九首》意涵的复杂性,也被《十九首》表面上的语言遮蔽了,所以用“辞情婉曲”来概括应是比较独到的见解,这也与后来的森槐南用“婉多风”来概括《十九首》异曲同工,田晓菲教授也说,《十九首》的佚名性存在着“对诗意确定性的抵制”。^[11]驹石之所以作《掇解》一书,因为《十九首》收录于《文选》之中,不便阅读,故单独将其抽出并加以注解。其体例是,注解以六臣注为主体,间出以己见,用“贞曰”表示。每首诗之前,或引六臣注,或以自己的话概括每首诗的大意,这种体例



与原狂斋的《十九首解》如出一辙，俱是模仿《诗小序》。

该书开篇，有驹石关于“古诗十九首”诗名的解题。关于“古诗”，其先引五臣之一吕向的观点：“不知时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诗’。”这是从成书时间上来定义的，而驹石认为：“古诗者，体裁之名，诗中所说亦不一焉，故但云古诗。”则从“体裁”（驹石理解的“体裁”可能更多是“题材”之意：“诗中所说亦不一。”）上来定义。关于这组诗是“十九首”还是“二十首”的问题，驹石先引“或曰”：“‘东城’与‘燕赵’明是二首，不应合而为一，宜为二十首。”这里的“或曰”可能即原狂斋之说，狂斋《十九首解序》中即云：“李善以‘燕赵多美人’别为一章，今从之，定为二十首。”但检李善注，并没有将“燕赵多佳人”以下“别为一章”之说，显系误记。《十九首解》成书早于《掇解》，驹石可能见过该书，不过他不同意“二十首”之说：“贞按：此说非也。至‘燕赵多佳人’一转，说出心曲，不得剖为二首，今随旧，标为十九首。”驹石关于“古诗”之意及篇数的看法应该是受到中西淡渊的影响，在《文选古诗十九首国字解》前一段类似解题的文字，淡渊说：“古代有种说法，因为分段多种多样，认为有二十首。这种说法难以被认同。”

与《十九首解》注重诗意图不同，《掇解》还有对诗歌语汇的训诂，如“今日良宴会”一诗中“弹筝奋逸响”，训“逸”曰：“纵也。”“奄忽若飙尘”，训“飙”曰：“暴风从下而上曰飙风。”“西北有高楼”一诗，释“阿阁”曰：“《说文》曰：阁，楼也。阿，四柱重屋也。曰高楼、曰阿阁，互言也。”这些注释都是《文选》六臣注没有的。再如释“西北有高楼”中“清商”曰：“五音之中，唯商最清，故云清商。商，伤也。其气遒劲，凋落万物，配之四时，则秋也。”这种解释毫不穿凿，清晰准确。《掇解》也注意诗句诗意图的串讲，他解“中曲正徘徊”曰：“愁人操曲，不觉入风起商声，却自感哀，终不能成其曲，舍琴而起徘徊也。”可谓得诗人心曲。

《十九首解》的注解对《十九首》多作“讽寓性解读”，而《掇解》则发挥较少，显得比较朴实，如解“涉江采芙蓉”一诗曰：“涉江，羁旅怀友，且起故国之思也。”而《十九首解》谓此诗“哀弃贤者也”，显然《掇解》的理解比较切合诗意图，故其诗句的解释也不作“演义”，而围绕着怀友的主题来展开：

涉江采芙蓉，贞曰：荷华。兰泽贞曰：兰多生之泽。多芳草。翰曰：芙蓉、芳草，以香美比德君子也。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贞曰：采香美之物，忽怀友生之德，故为诗以赠。还顾望旧乡，贞曰：因怀友生，遂生乡思。长路漫浩浩。贞曰：无穷也。同心向曰：友人也。而离居，贞曰：离群索居。忧伤以终老。贞曰：离忧与乡思交伤，人故老也。

再如《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二首诗，驹石皆解释为“妇人思夫也”，而《十九首解》释前诗“风信谗也”，释后诗“戒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则是从臣君关系角度解读这两首诗。可见，《掇解》的解释平实可靠。

但五臣注以来的诗歌阐释传统特别强大，对《十九首》的解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掇解》对一些诗歌的解读也不免运用这种模式，有的时候他是直接引五臣之注，有的时候是自己直接从君臣关系角度发表意见，如解“东城高且长”引张铣之说：“东城，刺小人在位，拥蔽明君，贤人不得进也。”这些诗，驹石自己没有发表意见，说明他是同意五臣观点的。而如“迢迢牵牛星”一诗，驹石释“终日不成章”曰：“不成锦也，喻臣虽有勋劳，不见用也。”“青青河畔草”一诗，驹石释“今为荡子妇”曰：“贤者有才而不见用，偶遇主则君暗昧，而唯好征役，譬若倡家女有伎艺而不沾，偶嫁则夫远行四方而不归者也。”这些解释在书中还有一些，固然是受到传统解释的影响，恐怕亦是驹石在本书序中所言的注重诗句“辞情婉曲”有关。即使如此，与《十九首解》比较起来，《掇解》的解释还算平实，“辞”与“意”之间的诠释张力没有《十九首解》那么夸张。

四、余论

除了《掇解》《十九首解》两种汉文注本之外，日本还有两种假名注本：中西淡渊的《文选古诗十九首国字解》、山景晋的《古诗十九首国字解》。此两书注重对《十九首》诗意图的串讲，对日本人理解《十九首》的诗意图较有帮助。中西淡渊在《文选古诗十九首国字解》前的解题中对《古诗十九首》的含义、作者、

分篇、内容都有所评论：

古诗指的是古代的诗。时代、作者均不可考，被称为古诗的缘由，在《诗薮》里有所记载。据说本来有几十首，逐渐散佚，只有二十九首流传了下来。因此，称“十九首”也并非从汉代开始，而是后来才说的。枚乘所作、子达所作、众说纷纭，李善认为并非是枚乘所作。据说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时，因为作者名不明，说应将其排在李陵的诗之前；严沧浪认为《行行重行行》这首诗“乐府以为枚乘之作”，一人一首，作者各不相同。此外，《诗薮》中一一评述了曹子建学习十九首的缘由，因此不应该用“子建所作”这一说法。以梁朝锺嵘在《诗品》中的简要论述为开端，众多诗话中众说纷纭，难以一一列举。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还是应当采用“佚名”说。因此，自古以来每首诗都没有题目，是后人根据每一篇的意思，推测此诗是咏何物、抒何情而附上去的。继《诗经》《楚辞》之后，因其诗情、辞藻十分古雅，成了诗人首先要吟咏背诵的内容。古代有种说法，因为分篇多种多样，认为有二十首。这种说法难以被认同。将其称作《诗经》之后的诗篇，并划分为十九首是近来才有的事情。李沧溟《送李相府》诗中也有提到“可怜郢曲今亡久，下里之歌吾何有。文章稍近五千言，雅颂以还十九首”。因（提及《十九首》的）诗话，均认为其“神奇”“温厚”“感怆”“和平”，故称赞文则《檀弓》，诗则《十九首》等，言其有着难以言喻的意趣，一字一句都补了上去。在文中，其深意或许难以得见，但是暂且可以略解其文字之意一二。这完全不是《十九首》本来的样子。徐祯卿也说：“遗编十九，可以约其趣。”^①

淡渊认为“古诗”是“古代的诗”，这其实是《文选》五臣之一吕向注的看法。他又否定了《十九首》是枚乘、曹植所作的观点，认为“还是应当采用‘佚名说’”，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稀松平常，但在几百年前亦属卓识。正如田晓菲教授所言的“佚名性只是《古诗十九首》多种隐晦特质(dark qualities)中的一项”，^[1]而“佚名性”也导致了《十九首》阐释的开放性。故淡渊下文又言《十九首》“有着难以言喻的意趣”，这也与古人尝言的《十九首》含蓄或“婉多风”的特质相近，而与陈绎曾称《十九首》“澄至清”^{[8](P2)}有一定的距离。从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十九首》阐释比较偏向于“讽寓阐释”一面，即强调《十九首》直白如话的语言背后有“难以言喻的意趣”，故《十九首解》《掇解》都倾向于从微言大义的角度解读《十九首》。淡渊虽然学术思想上属于折衷学派，但上文中他多次引用明人的诗句和诗话来评论《十九首》，这也是受到古文辞学派影响的痕迹。

《古诗十九首国字解》前有山景晋之《古诗大意辨题言》汉文序：

萧太子之《选》冠弃艺文，苟抵掌词苑、妆饰藻翰者，无不倚赖之者也。古人谓“《文选》烂，天下半”焉。今古宇宙中，中华、吾邦与经史并驱也，复那待余言乎哉？积翠散人尝喻予曰：“《古诗十九首》，其句温柔，其意敦厚，宜写一通贴诸壁上，而晨昏目视肄之，口诵习之，务之不已，则风韵格调浸润肺肝，而俗意日退，雅音日进也。”是仲英服先生之言也。尔后一奉教喻，卧而诵，起而吟，积累日月，换替裘葛，体裁熟目，声律上口，于是乎始览往日喻方之效，为诗肠针砭，斗酒嚶鸣，不啻是以欲授诸后学，而童子辈目熟之、口诵之不解，熟风调、气格之为益，有欲晓其意者，是亦非无益，因删改训点，解释以国字，虽然其字古而雅，其意仿佛至可解、不可解之妙旨幽致，非国字所尽，聊举大纲而塞童蒙之责云尔。壬子之春，山景晋孟大识。

本段首先介绍了《文选》的重要性，无论是“抵掌词苑”者，还是“妆饰藻翰”者都倚赖于《文选》。正因为讲到《文选》，就因为《十九首》是见载于《文选》的，故从学习文学的角度而言，《十九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接着又引用积翠散人对《十九首》的评论“其句温柔，其意敦厚”，所谓“温柔敦厚”是对《诗经》的定评，这里用来评论《十九首》，无疑抬高了《十九首》的地位。而且学习《十九首》还有另一层功

^① 李沧溟《送李相府》诗，即李攀龙《送新喻李明府伯承》。徐祯卿之语见其所著《谈艺录》。本文原为日文，承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伊丹博士相助译为中文，特此感谢。因为假名注本牵涉到日本国语学，国文学，本文暂且不论。

效,即如果浸润其风韵格调的话,则作诗“俗意日退,雅音月进”。正因为《十九首》的重要性,有必要向日本学人阐释其大意,故山景晋才决定以“国字”即日本的假名解释《十九首》。最后又提到《十九首》“字古而雅”,而且其意也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假名注释可能并不能阐发出其“妙旨幽致”,但对于《十九首》在日本的普及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在《古诗十九首国字解》前亦一段假名写成的解题,山景晋介绍了其用“国字”解释《十九首》方法与原则:“如果按照理解近体诗的方式,句句字字都加以翻译,反而会脱离了古诗的旨趣,因而止于介绍梗概。”^①所以国字解以介绍大意为主,并无发挥。汉文序中,山景晋提到《十九首》可以使“俗意日退,雅音月进”,而在假名的解题中,他也提出相似的观点:“有益于清洗俗肠。”

江户时代中后期的汉诗坛,先是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学派”(又称“叢园学派”)主张学习唐诗和明诗,明代七子之诗风靡一时,后堕入剽窃、剽袭恶习之中,故山本北山、大窪诗佛等人组成的“江湖诗社”提倡“清新自然”的宋诗,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南宋三大家成为当时诗坛学习的典范,但并没有兴起学习汉魏六朝诗的风习,何以当时会出现四部《十九首》的日本注本,很值得玩味,而且这四部注本中至少有三部与当时儒学发展中的折衷学派有关联,这就更值得仔细探究了。不过,这些《十九首》的注本成书就在“叢园学派”大行其道之时,从上文所引《先哲丛谈续编》可见金峨、狂斋等人还排击过徂徕之学。其时徂徕等人倡导的伪唐诗流行一时,折衷学派应是不满于当时的诗风,故有意以古朴的汉魏诗代之,遂取《十九首》而注之,这可能是江户时代《十九首》注本出现的学术背景。后来山本北山等人兴起宗宋诗风,肃清了伪唐诗和明诗之风,而山本北山亦为折衷派学者,可见江户诗坛诗风的变化其实背后都有其思想史背景的。

参考文献:

- [1]田晓菲.高楼女子:《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J].卞东波译.文学研究,2016,(12):1-12.
- [2](日)本多忠统.猗兰台集(卷四)[M].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诗集日本汉诗(第14卷).东京:汲古书院,1989.
- [3](日)森槐南.槐南集[M].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诗集日本汉诗(第20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
- [4](日)川田瑞穗.青崖先生寿言三十章[A].雅文会编.昭和诗文(第195辑)[C].雅文社,1933.
- [5](日)东条耕.先哲丛谈续编[M].东京:千锤房,明治十六—十七年(1883-1884)刊本.
- [6](日)东条耕.先哲丛谈后编[M].大阪:心斋桥群玉堂等,文政十三年(1830)刊本.
- [7]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汪俊,黄进德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9.
- [8]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9](日)大塚光信.新抄物资料集成[M].大阪:清文堂,2000.
- [10]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刘伏玲)

① 本文原为日文,承日本菲利斯女学院大学宋晗教授相助译为中文,特此感谢。